

学习鲁迅革命精神

鲁 迅 和 自 然 科 学

刘再复 金秋鹏 汪子春

一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从鲁迅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一侧面，同样可以证明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是千真万确的。

在鲁迅的战斗道路上，有一个重要的转变点，这就是一九〇六年，他决定弃医从文。鲁迅作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一件发生在日本的具体事情。一天，他在教室里看到描写日俄战争的影片，其中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体魄健全的中国人被帝国主义者一枪打死，而刑场周围的一些中国人却欢呼起来。这种景象，深深地刺痛了鲁迅的心，使他感到，从事新医学并不能实现他那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救国热望。而使鲁迅实行这一转变的时代条件，则是正在酝酿发展中的革命运动。当时，清朝反动政府，已经衰败到极点，中国人民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尽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的气，革命的怒火已无法抑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恩格斯说：“汹涌的革命浪潮使一切科学研究工作都退居次要地位；当时必须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409—410页）富于反抗精神的鲁迅，就在这种情况下，感到仅仅从事医学，难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因此，他抛弃用医学拯救祖国的幻想，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的激流中去。鲁迅这个决定，使他斗争的基本战线转移到文艺和其他思想领域。但是，鲁迅并没有完全离开自然科学这一阵地，相反，在他一生中，自然科学一直成为他的一种战斗武器。他从来没有减弱过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并一直关注着我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他对自然科学的认识，随着自己不断前进的战斗足迹，也留下不断发展的明晰线索。在早期和前期，他在自然科学领域里，就是一个坚定的唯物论者，他的自然科学思想中就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到了后期，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社会，同时也用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来观察自然界，并深刻地说明人类社会里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为我们留下许多极为宝贵的财富。研究鲁迅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研究鲁迅的自然科学思想，总结鲁迅为革命而从事科学活动的实践经验，对于继承我国的优秀科学文化遗产，对于建设我国的科学理论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对于研究鲁迅世界观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

鲁迅在弃医从文之后，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文艺和其他思想战线，因此，未能用更多的时间对自然科学本身的一些规律进行深入的探索。然而，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又作为一个热爱和熟悉自然科学的战士，他对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功绩。这些功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满腔热情地翻译世界上的一些科学论著,介绍世界上一些最先进的科学成就,通过多种形式进行科学普及工作。

2. 对自然科学的发展问题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前期有力地宣传了唯物论和具有辩证因素的发展观点,后期有力地宣传了辩证唯物主义。

3. 以先进的思想武器,针对旧中国的科学状况,勇猛地向束缚自然科学发展的反动社会制度和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旧传统观念以及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开拓道路。

最后一点是最根本的。可以说,鲁迅是我国现代自然科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伟大开拓者,是吹响我国现代科学革命战斗号角的一个先驱者。鲁迅为发展我国自然科学而不畏劳苦、披荆斩棘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一切从事科学工作的同志认真学习的。

二

鲁迅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间断过对自然科学问题的思索,直到他临终前几年,还一再呼吁从事文学的人应当学点自然科学。

鲁迅和自然科学关系的历史,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他从小就喜爱那些有关草木虫鱼的自然科学普及读物。在私塾读书时,常利用课余时间抄写这类小册子。抄书的喜好又引出他种花的喜好,在他天真的幼小头脑中,熟记着一些花草的栽培方法,而且把它们进行分类,并拿着《花镜》之类的书作为自己的工具书,鉴定这些花草的名称及其性质。当他得到一种新花草时,就在花盆上插上竹签,标好它的名称,写明它的品性。童年的鲁迅,对于探索自然界的花草秘密,感到特别有兴味。

一八九八年,鲁迅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第二年转入矿务铁路学堂。这一时期,鲁迅接触到维新派宣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比较全面地学习近代自然科学。他学习了格致(即物理学)、算学、地学(即地质学)、金石学(即矿物学)等。此外,还阅读了一些生理学和医学的书,如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他并不满足于学校里的这些功课,课余时间他总是到处去找书、抄书、买书。他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把英国地质学家赖尔的《地学浅说》译文抄订成两大本,并且把这书中精密的地质构造图描摹下来。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是鲁迅跑到离学堂很远的城南一家书店里买到的。这本书引起鲁迅浓烈的兴趣,在矿路学堂的读书处,鲁迅经常在那里看《天演论》(《朝花夕拾·琐记》),书中关于生物进化的基本思想给鲁迅以很大的影响。反对形而上学,反对上帝创造人类与万物的迷信,把上帝这一人造的权威从自然界赶走,这在鲁迅心中引起深深的共鸣,使得鲁迅初步形成新的必胜旧的,青年必胜老人,将来必胜于过去的社会发展观。鲁迅从进化论中得到唯物地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并吸收了进化论中具有辩证因素的发展观点,进化论成了他前期战斗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

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传入,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从事于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并幻想自然科学能够救中国。青年的鲁迅也想用西方的医学,来救国救民,“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呐喊·自序》)一九〇二年从矿路学堂毕业的鲁迅,正是抱着这个善良的愿望去日本留学的。在大海的彼岸,决心为祖国献出生命与热血的鲁迅,为了使自然科学在祖国得到发展并促进祖国的革新,他于一九〇三年开始了宣传科学的写作活动,发表了《说钼》、《中国地质略论》两篇自然科学论文,并花了很

大的精力,从日文译本转译了法国科学小说家儒勒·凡尔纳著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章回体小说形式介绍给祖国人民,用以普及科学知识。这期间,鲁迅还翻译了《北极探险记》,编著了《中国矿产志》一书。这些译著,使我们看到当时的鲁迅胸中燃烧着热烈的爱国主义的火焰。

一九〇四年九月,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结识了他深深尊敬的藤野先生,从这一位认真而和蔼的老师那里,学了骨学、血管学、神经学。但是,为了祖国,他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医学,于一九〇六年夏天,前往东京,投身于反清的革命活动,同保皇的改良派进行斗争,并在革命刊物上发出新的战斗呐喊。一九〇七年他写了《人之历史》和《科学史教篇》两篇重要论文。《人之历史》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史略,《科学史教篇》考察西方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方面所起的作用。鲁迅在论文中通过科学史实来反对保守落后思想,这是与他所抱定的“改变精神”的志愿相一致的。

一九〇九年八月间,鲁迅回到中国。他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员。这个学校分初、优级两部分。鲁迅担任初级的化学、优级的博物科的生理卫生教员,又兼生物学科的翻译。教学中,鲁迅通过传播自然科学知识,启发学生破除旧观念,他教《生理学》时,用通俗浅显的例子讲授“胚胎学”,批判了那种“转世轮回”的宿命鬼话。更使当时一些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冲破了学校制定的禁令,向孔孟之道挑战,破例地讲了生殖系统,使全校师生皆为之惊讶。现在还保存着的当年鲁迅编写的生理学讲义《人生象学》里,就有关于生殖系统的一章。此外,鲁迅每个星期还带学生到野外实习一次,在钱塘门外采集植物标本。鲁迅为了让学生了解植物生长的全过程,规定学生采集时,在植物开花期一定要采集有花的,结果期一定要采集有果的。鲁迅还常鼓励学生要敢于解剖人体,他向学生们谈到自己在学医时期解剖尸体的体会时说过,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什么了。(夏丏尊:《鲁迅翁杂忆》)鲁迅以严正的科学态度,率领学生冲破孔孟那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思想牢笼,这在“子曰诗云”还横行中国的时候,是富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的。

这是鲁迅早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一些状况。

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他完成世界观的转变。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此时大力鼓动“科学”,以科学作为重要的批判武器,把迷信、落后、守旧反动的封建主义老八股、老教条剖析得淋漓尽致,把它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丑态揭露得最生动、最深刻、最充分。这时鲁迅手中的科学武器,还不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与同时也在高喊“科学”的胡适、丁文江之流的科学概念截然不同。胡适和丁文江的所谓科学,其实是腐朽的反科学的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而鲁迅提倡的科学,则是现代自然科学和进化论、无神论、唯物论等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鲁迅通过用随感录、杂文、散文甚至小说的形式,热情奔放地宣传科学,旗帜鲜明地把斗争矛头指向阻碍科学发展、危害民

族生存的孔孟之道，指向猖狂宣扬迷信、愚弄人民、守旧反动的封建顽固派。这不仅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扫清障碍，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封建营垒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冲击。

然而，进化论和朴素唯物论毕竟未能给反动的社会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以深刻的、彻底的批判，也不能给自然科学的发展找到根本的出路。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根源在哪里？自然科学的根本出路在哪里？人类社会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哪里？这是鲁迅后期在自然科学方面探索的中心课题。这些关于自然科学发展中带全局性的问题，是鲁迅早期、前期未能明确回答的。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一个思想家、科学家仅仅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是无法解决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这些观点甚至反转过来成为他继续前进的障碍。鲁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停留在前期的水平上，而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通过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突破进化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局限，树立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随着鲁迅整个世界观质的飞跃，他对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也有了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包括自然科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从全局上为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道路。鲁迅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终于正确地回答了他前期未能回答的问题。这个时期，鲁迅发表了许多对自然科学发展问题的精辟见解，散见在他的论文、杂文、书信当中。他写了《“进化”与“退化”小引》、《“蜜蜂”与“蜜”》、《经验》、《电的利弊》等涉及自然科学的重要文章，并翻译了《药用植物》一书。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尽管战斗紧张，身体不好，但仍然念念不忘和周建人同志翻译法布耳的科学小说《昆虫记》。和鲁迅的整个世界观一样，这时期鲁迅的自然科学思想已经成熟，达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高度。和他早期、前期的自然科学思想相比，有明显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关于科学发展的动力

鲁迅早期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在社会领域里，还不是一个历史唯物论者，他还未能看到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

由于早期的鲁迅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有着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因此，他正确地说明了科学的起源，指出由于“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然后“递有剗木剗木之智，乃始交通”，（《月界旅行·辨言》）肯定自然科学的萌芽是由于征服自然的需要而产生的。鲁迅还正确地说明科学的发展和生产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科学与实业是“相互为援，于以两进”的。鲁迅在写作第一篇科学论文《说钼》时，就否定科学发展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产物，而认为是前人科学工作的继续和发展。鲁迅这些唯物主义的见解在当时是很杰出的。但他还未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在自然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到了后期，他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解释谁是科学的真正创造者这一根本问题。鲁迅坚决批判古圣人创造药物等科学文化的唯心史观，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这一光辉论断，用极其明确的语言，指出劳动人民（无名氏）是科学文化的伟大创造者。这说明鲁迅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历史唯物论的高度。

2. 关于科学与社会制度、社会思想的关系

鲁迅早期从日本史书中知道，“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因此，他也想用

医学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但是惨痛的事实,使他了解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呐喊·自序*)严重的问题是改变人们的精神。这以后他继续写了一些自然科学论文,通过宣传自然科学,为祖国的变革制造舆论,启发人民对社会改革的信仰。五四时期鲁迅宣传科学表现出更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尽管当时他仍笼统地认为科学是疗救中国的药方,但这时讲科学已着重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了。他指出:“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热风·随感录 38*)。这个时期鲁迅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提倡科学与反封建、反孔家店密切结合起来。因此,他用科学这味“药”,所要医治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守旧、倒退、迷信等等思想上的“祖传老病”。如果不治好这一老病,不打破封建主义的思想枷锁,不改变“国民性”的病态,纵有某些科学技术,国家也无兴旺的希望。他说得很好:“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华盖集·补白*)鲁迅看到,国家的强弱,科学技术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关键的问题是掌握科学技术的“国民”是怎样的人。鲁迅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这时用的还是“国民”一类的概念,还未能用非常鲜明的阶级观点进一步去触及问题的根本处。到了后期,他深刻地认识到,“国民”是划分为阶级的。少数的“国民”——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他们的法西斯国家机器,成为束缚科学发展的巨大锁链。即使有某些外来的科学技术成果,也成为他们实行专政的“济私助焰之具”。火,竟成了他们烧毁人民房屋的器具;电,竟成了他们对人民实行电刑的器具。在反动社会制度的条件下,作为从事科学的个人,即使不愿意为反动派服务,想做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也是无济于事的。鲁迅在给一个当医生的亲戚题词中说:“杀人有将,救人為医。杀了大半,救其子遺。小补之哉,乌乎噫嘻!”他还说:“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且介亭杂文·拿破仑和隋那*)鲁迅已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命运,是受着社会制度制约的。科学研究是离不开政治的,必须由政治所统帅。就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来说,在少数剥削者专政的世界里,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对革命人民进行屠杀和镇压,他们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利用科学技术来“毁坏世界”,把亿万人民置于苦难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医学一类的科学工作,确实只能起“修补”作用,决不能从根本上拯救人民,使人民改变苦痛的境地。就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来说,科学技术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这是科技发展问题的决定点。旧中国科技处于绝境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社会桎梏,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双重压迫以及适应这种压迫的反动社会制度。因此,鲁迅终于得到这样的结论:“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二心集·〈进化与退化〉小引*)自然科学的发展问题,必须靠社会科学来解决,即靠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来解决。只有社会的解放,科学才能随之得到解放。

3. 关于对自然科学若干问题的认识

鲁迅早期的自然科学思想中,虽然有不少辩证的看法,但还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因此,他的辩证观点还是不彻底的。在某些问题上,如对中医的看法,还有片面之处。他对中医,未能分清其精华与糟粕,未能把儒医与中医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在批判儒医时,曾笼统地对整个中医加以鞭挞。后来,他纠正了这个“偏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中医,热情地肯定祖国医药学是个“丰富的宝藏”,给中医以科学的合乎实际的评价。

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科学家,鲁迅早期强调学习较多,对其局限性注意得还不够。后期的论述就深刻、全面得多。他对外国的科学家,注意一分为二,肯定其贡献,揭示其不足。在对待外国科学文化遗产问题上,鲁迅已有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他痛斥洋奴买办们说什么“中国人失去自信力”的谬论,主张靠自己的力量踏出一条“新生路”,反对洋奴哲学。他愤怒地指出,洋奴们所讨乞的,洋主子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送来的,根本不是什么科学技术,而是毒化、危害中国人民的黑货:“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反对洋奴哲学,但又不拒绝学习外国好的科学技术,他主张对外国的科学文化要采取有分析、有批判的“拿来主义”,即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自己的需要,放出眼光,运用脑髓,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为我所用,把自己的创造和批判地吸收外国好的科学文化两者结合起来。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后期对自然科学发展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鲁迅关于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必须靠社会科学解决的论点,关于人民群众是科学的创造者的论点,关于以自己创造为主并批判地吸收外国科学技术养料的论点,是鲁迅自然科学思想中的精华。在旧中国,这是对自然科学发展问题最正确、最清醒的认识。鲁迅这些重要结论,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自然科学范围里,鲁迅也没有例外。他经历了长时间的观察、研究和实践,研究国内外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旧中国科学技术停滞不前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他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武器之后,了解了社会和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使自己的自然科学思想大放光彩。鲁迅后期对自然科学发展的精辟见解,是鲁迅留给科学技术界的一分极为宝贵的遗产。继承和发扬这份遗产,学习鲁迅这些光辉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学习这些思想,我们就能更清楚地认识到:革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火车头;劳动人民,是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力军。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只有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政治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唯生产力论和技术挂帅,才有光明的前途。

鲁迅的自然科学思想,是鲁迅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鲁迅对自然科学认识的发展线索,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作用,在鲁迅世界观转变后,他的自然科学思想才完全成熟,达到正确的认识。研究鲁迅的自然科学思想,是研究鲁迅世界观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

随着鲁迅整个思想的发展,鲁迅的自然科学思想也不断深化。而鲁迅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和掌握,又对他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他一生赢得辉煌战绩,起了一定的作用。

恩格斯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反杜林论》第8页)在鲁迅自然科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中,有一个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深刻见解,这就是历史不是由“名家”(英雄)创造的,而是“无名氏”创造的,他认为对名家要有分析,不能盲目迷信。天才人物如果离开人民群众,就象离开泥土的花木,就要枯死。形成鲁迅这一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主要是由于他努力参加革命实践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但他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则为这一认识提供了可靠根据。他列举科学史上许多生动的事实阐明了这一认识,使人信服地相信这一马克思主义真理,也令人信服地感到这一马克思主义

真理已化为鲁迅的血肉。

鲁迅不倦地学习自然科学,宣传自然科学,不是为了自我表现,装璜门面。他的学习和宣传,是为人民,为革命,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鲁迅后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纯科学技术是救不了中国的,但是他又看到,“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尖锐地看到,帝国主义及其奴才们正利用自然科学作为反人民的武器,他必须针锋相对,给敌人以“报复”。他说:“原人对于动物的威权,是产生于弓箭等类的发明的。至于理论,那不过是随后想出来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作用,在于制造自己威权的宗教上,哲学上,科学上,世界潮流上的根据,使得奴隶和牛马恍然大悟这世界的公律,而抛弃一切翻案的梦想。”(《准风月谈·同意与解释》)鲁迅这一论断是非常深刻的。反动阶级为了维持“压迫有理”、“剥削有理”这个“公律”,制造种种根据,其中包括“科学”上的根据,他们利用唯心主义的伪科学愚弄、欺骗人民,使他们安于牛马的地位。而奴隶们要革命,就要打翻旧案,把它变成“造反有理”、“革命有理”,为革命制造舆论。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用自然科学这个战斗武器,戳穿反动阶级伪科学的假面,使人民识破反动阶级的欺骗宣传,提高推翻旧世界的勇气和革命自觉性。鲁迅学习、宣传自然科学,正是服务于革命目的的。所以鲁迅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主张把讲自然科学和发表政治议论结合在一起,主张讲自然科学时,要有战斗性。刊物不要尽发表一些脱离政治思想斗争的纯自然科学的学术文章,而应当多发表一些结合批判封建思想的文章,把讲科学作为反帝反封建这个总战线中战斗的一翼。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鲁迅在给《新潮》社编辑的信中,非常鲜明地提出这个重要问题。他说:“《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譬如说天文忽然骂阴历,讲生理终于打医生之类。现在老先生听人说‘地球椭圆’,‘元素七十七种’,是不反对的了。《新潮》里装满了这些文章,他们或者还暗地里高兴。(他们有许多很鼓吹少年专讲科学,不要议论,《新潮》三期通信内有史志元先生的信,似乎也上了他们的当。)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集外集拾遗·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正是把讲科学巧妙地融汇在他革命的舆论里,因此,使宣传科学成为鼓动革命、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手段,并使革命的舆论更加富有科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样,也就使鲁迅射向敌人的匕首与投枪的锋刃,变得更加锐利。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曾写信给马克思说:“**对古代史的重新研究和我的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第20页)鲁迅也正是这样,他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使他在同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派别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表现出更大的战斗威力。仅以鲁迅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就可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人性论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理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围绕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还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尖锐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

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梁实秋,侈谈抽象的“物质状态”、“人性素质”,并以此为根据,用普遍的人性来否定每个人具体的阶级属性。鲁迅坚决地戳穿了梁实秋伪科学的假面具,用自然科学中物质及其属性的辩证关系为例,有力地驳斥梁实秋立论的根据。鲁迅说:“譬如原质或杂质的

化学底性质，有化合力，物理学底性质有硬度，要显示这力和度数，是须用两种物质来表现的，倘说要不物质而显示化合力和硬度的单‘本身’，无此妙法；但一用物质，这现象即又因物质而不同。”（《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用这一例证说明，物质的属性离不开物质，一般的概念不能完全脱离具体事物而孤立存在，而具体事物又有千差万别，因而一般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就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喜怒哀乐，这是一般的概念，也是人的一种“属性”，它是不能孤立存在的。世界上决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通过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具体的人性，而生活在阶级社会里的人，他表现出来的“人性”，就不能不表现为不同的阶级属性。所以鲁迅接着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就把超阶级的“普遍的人性”的骗人的鬼话驳得体无完肤了。梁实秋不仅把人性说成是超阶级的，而且是超时代的“永久不变的人性”。对此，鲁迅又用人类从猿进化到人的生物史事实严加驳斥。他说：“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未来的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而已集·文学和出汗》）由于鲁迅熟悉人类进化的全过程，自如地运用到论辩中，因此便更有力地揭穿人性不变论的荒谬性。从以上例举的批判中，我们看到，鲁迅对人性论的批判，使用的基本武器，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只有这一思想武器，才足以从根本上揭穿人性论的反动性。一般的自然科学思想，不能完成批判的任务。但是，我们也看到，自然科学知识，体现发展观点的生物进化的历史事实，有助于鲁迅的战斗。由此可见，有无科学知识，在战斗中效果是不同的。

鲁迅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仅使他的杂文增加了批判的力量，而且大大增加了感染的力量。自然科学知识，使他的杂文的革命内容更加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鲁迅把孔孟之道比成细腰蜂的毒针，象细腰蜂用毒针把青虫螫得不死不活一样，孔孟之徒用旧思想、旧文化麻醉毒害人民，以便使人民麻木不仁，甘心“做稳奴隶”，甘心“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由于鲁迅对生物学、昆虫学非常熟悉，因此能够选择一个最恰当的例子，淋漓尽致地把孔孟之徒的凶恶、毒辣、用心之险恶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使人们读后感到触目惊心。鲁迅自己说过，他创作小说《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当然，《狂人日记》的产生，首先是当时的时代条件和鲁迅的思想条件，但自然科学知识也帮助了鲁迅。鲁迅一再提倡从事文学的青年，应当学一点自然科学，其理由我们从鲁迅的战绩中是可以找到最好的答案的。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鲁迅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学习社会，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解剖自己，改造自己。离开这一根本原因，不恰当地强调自然科学的作用，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掌握自然科学知识，更多地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也是一个因素。许广平同志说，鲁迅“造诣的深，学识的博，文章的所向无敌，就是随手拿科学的方法，解剖，分析，综合，证明的”。（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许广平同志的话是有根据的。今天，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国人民正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不畏艰险地勇于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我

们应该更好地学习鲁迅,从伟大的革命家鲁迅身上吸取无穷的榜样的力量。我们要象鲁迅那样,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革命,不断前进,注意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注意把科学发展问题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在我们的科学工作中,更好地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指引下,在鲁迅曾经辛勤开拓过的科学道路上,努力作战,为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